

研究论文
Articles

马来西亚华社语言规划之管见*

Language Planning for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王晓梅
(WANG Xiaomei)

摘要

语言问题一直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近来,中文媒体围绕着方言的存废展开了讨论,提出保护方言的种种方案。考虑到马来西亚的特殊国情,例如国家语言政策、族群分布、华社结构等,华社必须理性地分析所面临的语言问题,提出合理而可行的语言规划方案,才能因应国内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现状以及国际间交流和沟通的需求。本文尝试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梳理目前马来西亚华社的语言状况,针对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认同规划提出初步的想法。

关键词: 语言规划、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语、方言

Abstract

Language has always been a sensitive issue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Recently, a discussion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ese dialects has been reported i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various proposals to preserve dialec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ak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demographic complexity, and

* 本研究得到 UM.C/625/1/HIR/MOHE/ASH/04 研究基金的支持,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规划》项目的部分成果。

王晓梅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院;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E-mail: wangxm@um.edu.my

composi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anguage issues should be treated seriously and rationally. A rational and practical language planning scheme should be proposed to respond to the multicultural and multilingual reality in Malaysia and the need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report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atus planning, corpus planning, acquisition planning, and identity planning.

Keywords: language planning, Malaysia, Chinese community, Mandarin, dialect

一、前言

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是海外华人社区中较为特殊的一个，其人口比例、母语教育、语言维护等都明显地异于其他海外华人社区。就人口来说，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639万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4.6%；就母语教育来说，1,240所华文小学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60所华文独立中学属于私立性质，另外还有3所华文学院。就语言维护来说，大多数的华人都会说华语或方言，中文仍然是家庭和社区语言，而且也获得媒体和教育的支持。因此，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面对的语言问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就社区外部来说，马来西亚华人要学习国语，即马来语，这主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完成；同时，他们还要学习国际语言英语，除了少数以英语为母语的 household 外，这也主要依靠学校教育来完成。就社区内部来说，华语逐渐成为强势语言，越来越多的华人以华语为母语；弱势方言（如海南话、潮州话、半岛地区的福州话等）逐渐消失，强势方言（如广东话、福建话、客家话）仍然是特定区域的共同语。近年来，华人社会外部语言的问题主要是英语教数理的问题¹（Gill 2005），而内部语言问题则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方言是否需要保护与抢救？（2）方言流失是华人社会的危机吗？（3）华裔学生中文水平下降了吗？（4）如何复兴方言？（5）如何在华语与方言之间取舍？尤其是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意识越来越强，以上问题在主要的中文报纸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下是几则《星洲日报》言论版的讨论：

(1) 早前各方在讨论“方言流失”课题时，有论者将今天“方言式微”的困境归咎於70年代展开的“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完全漠视当时民间运动的历史因素、华教处境及华社意愿，甚至说“华语入侵家庭？方言岌岌可危”、“20年来强调学习华语，使家庭母语消失”云云；一味以负面的观点“冤枉”华语为“罪魁祸首”。（许运发 2012）

(2) 近年发现很多华人孩童在家在外都用华语沟通交谈，甚少会用自家的母语交谈。这与学校规定不得说方言有关。

渐渐的现在的父母就习惯和孩子用华语或英语来交谈，除非家中有长辈不通晓华语，还会用自身籍贯的方言和孩子沟通以外，孩子们接触方言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其实学习方言有很多好处。笔者本身籍贯是广东，但基於母亲是福建人，加上小时候住家靠近外婆家，周围都是福建人，从小在家在外都是用福建话沟通，福建话说得和福建人一样好。回到祖母家中是偶尔也要说广东话，但当时妈妈及兄弟们的广东话都不灵光，不知不觉祖母家中的成员也参差说一些福建话。（平凡人 2012）

(3) 黄怀乐君在《沟通平台》发表文章说，通过地缘性组织是抢救方言的最佳管道。我也想表达个人的看法。

方言趋向式微，问题的症结乃是为人父母者对祖籍母语没有情意结，他们普遍认为华语是华裔的共同语言，刻意使用华语与子女交谈，延续至今，会讲方言的新生代已成了“稀有动物”，此情此景，让人担心！（罗北振 2012）

以上这些讨论反映了几个问题：（1）马来西亚华社向来缺乏系统的语言规划，（2）国内外语言环境、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给语言问题带来新的挑战，（3）新一代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意识提高了。因此，现在也许是讨论语言规划的最好时机。本文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1）目前马来西亚华社的语言规划情况如何，相关的语言政策有哪些？（2）目前面对的问题有哪些？（3）未来的语言规划框架应考虑哪些因素？

二、理论背景

语言规划的研究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它最初的动力和目标是解决前殖民地国家的语言问题，因此语言政策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然而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人口的流动、人们语言意识的提高，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进而引发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Hogan-Brun 2010）。有学者开始以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来代替传统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Spolsky 2009），这都反映了人们语言观念的转变。在传统的语言规划框架下，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二分最为常见，之后又增加了习得规划、声望规划（Baldauf 2006）和认同规划（Zhou 2006），这种划分是以语言规划的目标为导向（Baldauf 2006），本文的讨论将以此为基础。

另外，就语言规划的层次而言，学界有两种观点：（1）语言规划是有层次性的，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Kaplan 和 Baldauf 1997），（2）语言规划无层次性可言，应以语域（domain）为单位来研究，例如家庭、宗教、工作场合、学校、司法、医疗、军队、各级政府等（Spolsky 2009）。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三分法把国家或政体、社区或机构、个人分为三个层次，强调微观层次的重要性，其参与者或者执行或者抵制宏观政策，而法庭、学校、家庭等是典型的例子（Baldauf 2006），这与基于语域的讨论其实是一致的。本文讨论的对象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区，是社区的层次，因此可界定为中观语言规划的层次。

目前的世界趋向多元化发展，纯粹单语的国家越来越少，国际移民的增加、英语的扩张、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意识的觉醒等因素导致各国的语言问题日趋复杂。对于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来说，语言规划不仅要顾及整体国家利益，也要考虑少数族群的群体利益。因此有学者主张区分主体语言规划（majority language planning）与少数族群语言规划（minority language planning）（Coluzzi 2007）。这一区分也适用于马来西亚，国家语言规划以全局为考量，而各民族的语言规划则是从各自的情况出发而做出的。华人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少数民族，其语言（华语及方言）是马来西亚珍贵的资源，无论是社区内部交际还是跨国交流都急需系统的规划，

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是其中一个视角。

三、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规划现状

马来西亚华人大多源自中国南方各省，其语言状况深受中国语言发展的影响。华人移民把闽南语、粤语、客语等方言传播至海外，并与当地语言接触产生混合语，例如巴刹马来语等。早期移民按照祖籍地聚居，方言成为联系彼此的重要枢纽。新文化运动之后，华语开始进入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习得华语。同时，殖民语言英语也成为少数华人的家庭语言。马来西亚于1957年独立后，马来语成为国语以及唯一的官方语言。政府为了增强国家凝聚力，开始大力提倡马来语，并且成立语文局，致力于马来语的规范、翻译及推广。反观华人社会及印裔社会，其语言缺乏统一的管理及规划。以下我们就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声望规划、认同规划等几个方面来讨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规划现状。

（一）地位规划

1967年的《国语法案》规定马来西亚的国语是马来语，马来语也是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规定意味着前殖民语言英语失去了官方语言的地位，而其他族群的语言，例如华语、淡米尔语、伊班语²等都没有任何的官方地位。不过宪法保障人民使用语言的自由，各种语言在非官方领域可以自由使用（叶玉贤 2002）。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的语言规划走的是单一语言的道路，与其他多民族国家，例如新加坡截然不同。华人作为最大的少数民族，语言意识也最强烈。自1953年起，华社先后多次公开呼吁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教总³于1965年发起“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1969年大选前期马华公会⁴再次提出将华语和淡米尔语列为官方语言的诉求（叶玉贤 2002）。然而，这些运动或诉求都失败了。

从地位规划来看，马来西亚的语言规划是自上而下的，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Asmah 1982）。从民间的反馈来看，少数族群维护族群语言

的愿望十分强烈。显然，语言政策与语言现实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以马来语为主导的语言政策执行半个世纪以来，也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 (Spolsky 2009)。华语虽然没有任何官方地位，但已经成为华人社会的共同语。

(二) 本体规划

由于华语不是官方语言，因此马来西亚并没有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华语的规范与推广，有关工作只能间接通过教育部属下的课程局中文组来开展。另外，民间组织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也致力于人名、地名的翻译工作。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华语的使用仍然处于自治的状态。

就汉字的使用来说，马来西亚于 1982 年开始采用中国的简体字和汉语拼音，并在学校推广。词汇方面，主要厘定了马来文地名和人名的中文译名，语法和语音方面都根据现代汉语的规范。词典编纂方面注重华语与马来语双向词典或华、马、英三语词典，这些词典均由民营出版社出版。

(三) 习得规划

习得规划主要体现在语言教育。马来西亚早期的中文教育以各种方言为教学媒介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华语开始取代方言成为中文学校的教学媒介语。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华文小学被纳入国民教育系统，采用华语为学校行政语言及教学媒介语，招收以华人为主要的学生，兼收马来学生及印裔学生。目前，全马共有 1,291 所华文小学，学生人数约为 60 万⁵。华文小学的特点是三语教学，即华语、马来语和英语。

华语教学以第一语言教学的形式进行，课程的总目标是“使学生能充分掌握听说读写的技能，准确地应用规范的华文来思考、学习、交际、处理信息和创作。同时借语文的教学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培养审美情趣、爱国情操，促进文化的传承，达致全民团结”⁶。小学华文课程内容涵盖语文基础知识，以语音教学为例，六年级的课程纲要写明其汉语拼音的教学内容包括：“啊”的音变、有规律的轻声和无规律的轻声、

儿化韵。这样的教学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脱离了小学生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中学阶段的国民教育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华文是其中一个科目。每个班级如果有15位学生提出修读华文请求,学校则必须开设华文课。中学阶段的华文课程的总目标为“使学生能应用华文来思考、学习、社交和欣赏各种文艺作品,并能应用规范的华文来进行创作。同时借着语文的教学促进文化的传承,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⁷。中学五年的华文教学仍然是以第一语言教学的方式进行,华文和中国文学是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的其中两个科目,但不是华裔学生的必考科目。大学先修班及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也设有华文科目,但是很少学校开设华文课,选考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就方言的习得而言,教育体系并没有提供任何的支持,方言习得主要依靠家庭、社区及媒体。近年来,弱势方言的流失愈发严重(Wang & Chong 2011),强势方言(如粤语、闽南语、客语)依靠社区及媒体的支持而保持活力。华人社会普遍关心方言流失的问题,各宗乡会馆开始提供各类方言课程,试图“抢救”方言。但是,如果缺乏系统的规划,这种努力恐怕是杯水车薪。

(四) 声望规划

声望规划的主要目标是语言的推广(Baldauf 2006)。在政府层面,马来西亚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广华语第二语言教学,这个计划(BCSK)主要在国民小学推广,对象是马来族或印裔学生。中学阶段则提供母语班,供华人学生选修。大学阶段,很多政府大学都开设华文选修课。2009年,马来亚大学与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设立了孔子学院,掀开了推广华语的新篇章。

在民间层面,推广华语的活动从未间断,民间众多的语言学院、语言中心对华语的推广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也是华语推广和传播的重要媒介。目前,马来西亚华语推广的动力之一是日益重要的马中经贸关系,首相纳吉曾在不同场合提到华语的重要性,他的儿子特

意去北京学习华语，政府每年都派学生前往北京浸濡。而且，越来越多的非华裔学生入读华文小学，我们最近在砂拉越州的调查发现，很多土著例如毕达友族（Bidayuh）把孩子送进华文小学。这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说流利的华语，将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可见，华语已经成为一种有经济效益的语言，这对华语的推广显然是有益的。

2009年华语规范理事会与天津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中心联合举办了普通话水平测试，正式将这一考试引入马来西亚。虽然这项测试完全采用中国普通话的标准，并未考虑本地华语的特点，但为本地华语的规范化提供了一定的标准和努力的方向。

反观方言的情况则不乐观，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推广方言的举措少之又少，而且似乎偏向粤方言的推广，例如电视、电台都有粤语的节目。各宗乡会馆偶尔推出方言学习班，但影响力非常有限。

（五）认同规划

语言认同对于语言规划来说至关重要，而且语言认同是可以规划的（Zhou 2006）。如果语言社区成员对其语言缺乏认同，那么其传播必定受阻；相反如果语言社区成员对其语言建立了强烈的认同，那么其传播则顺畅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对于华语的认同度是很高的，这样的认同是建立在共同的语言观念基础上的。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观念就是“华语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母语”，这样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多元种族背景的影响。华语成为联系或团结各个方言群的工具，并且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指标，不会说华语的华人则被贴上“香蕉人”的负面标签。作为多元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群，维护共同语是维护族群利益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这样的认同规划是成功的。

随着大家对华人身份认同的增强，方言认同的程度也相应的减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方言认同失去了价值，问题是方言认同没有得到很好的规划。

四、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规划面对的问题

就语言本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文字：存在简体与繁体并存的情况，造成社会用字紊乱。（二）汉字注音系统：存在汉语拼音与方言拼音并存的情况。（三）语音：基本不使用儿化与轻声，但却是学校考核内容。（四）词汇：存在大量的地区词。（五）语法：存在少量方言语法。

就语言使用而言，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华社共同语的选择：应该是华语，还是英语，抑或粤语？（二）语体的选择：普遍存在口语与书面语体不分的情况，部分华语使用者不能随场合而选择语体。

另外，华语与方言的关系以及英语与华语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厘清。

五、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规划应考虑的因素

针对马来西亚华社语言规划现状与面对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的想法：

（一）地位规划：由于地位规划是政府行为，尽管华社做了许多努力，但华语成为官方语言的希望似乎非常渺茫。但是事实上华语已经成为华社的共同语，在华社内部，许多正式的场合都使用华语。

（二）本体规划：应该注重规范的确立与执行，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本地华语的特点。进一步确定简体字以及繁体字的分工及使用场合，监督社会用字；限制方言拼音的使用（如姓名拼写等），推广汉语拼音；不过度强调轻声、儿化等语音现象，不应列入小学教材；对于有地方特色的社区词不应该持抛弃的态度，而应该与其他华语社区“求同存异”（汪惠迪2009）；语法尽量与中国普通保持一致。

（三）习得规划：华语的习得主要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如第四节所言，华文小学采用第一语言教学的方式教授华语华文，但是某些教学内容过于专业化，例如语音教学中的语流音变规律，这完全是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范围，不适宜在小学阶段学习。另外，过于系统的语法知识也流于灌输

式教育，事倍功半，建议尽量简化。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限于客观条件而无法充分展开，因此是否能达到教学目标是个很大的疑问。另外，因为这个环节语文教育的欠缺，我们也必须明确在这个框架下毕业的学生也无法与其他华语地区（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相提并论。因此，与其抱怨学生语文水平下降，还不如想办法健全我们的语文教育。至于方言的习得，现实条件不允许华社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方言教育，方言的维系主要靠家庭和社区。随着方言间通婚比例的上升和人口的流动，家庭维系方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四）声望规划：华语的推广还可以更系统化。政府应意识到马来西亚有丰富的华语资源，作为一个多元语言的社会，族群间语言与文化的了解非常重要。然而，本地大学并未开设学习异族语言文化的本科专业。政府每年保送学生去中国学中文，却忽视了本土已有的华语资源。假如这个社会有精通华语的马来人、印度人，有精通淡米尔语的华人、马来人，那么社会将更加和谐。

（五）认同规划：华语正走向世界，因此除了加强“华语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共同语”的认同外，我们更要认识到“华语是华人共同语”（郭熙 2012），是与其他地区华人沟通的工具与桥梁。方言的认同也要加强，只有方言认同增强了，方言才有希望存活下去。大众传媒在认同规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培养大众的语言意识，激发大家对族群语言（方言）的思考与反省。

（六）语言经济：近年来，语言经济的研究慢慢成为一个热点，语言也可以创造经济价值。根据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研究，瑞士国民生产总值的 9% 受益于语言的多样性（Grin *et al* 2009）。格林教授的研究团队还调查了多语在不同行业的价值，结果显示 IT 业的多语价值最高（22.67%），其次是化学工业（16.2%）、运输业（16.03%）、机械工业（15.31%）、制造业（12.33%）及金融业（11.92%）。这个研究成果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马来西亚的多语资源如果充分利用，其可以创造的经济价值将超过 10%。就华社来说，华语和方言在区域及世界经济中都非常重要，华语是世界华人经济圈（中、港、台、海外华人）的语言，而粤语是粤文化经济圈（香港、

广东、英国、马来西亚等)的语言,闽南话(福建话)是闽南文化经济圈(福建、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的语言。而且语言的经济效益可以体现在各行各业,例如服务业(如餐饮、酒店、零售、旅游等)、金融业(银行、保险、贸易等)、教育业(语言教育机构、翻译等)。华社将来的语言规划应充分考虑语言的经济价值。

(七)语言规划的制定者:华语及方言的非官方地位导致其规划的制定与执行都带上了一定的难度,政府并不是语言规划的唯一制定者。这个过程涉及的部门和组织包括:教育部、华语规范理事会、媒体、董教总等。众多的参与者导致规范与规划的确立与执行都存在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语言规划都由政府部门主导与监督,马来西亚的特殊国情也许要建立新的语言规划模式。华社或许可以考虑社区语言规划的模式,即以社区为单位进行规划。例如全马有很多华人新村,这些新村形成一个言语社区,有共同的语言规范与认同(徐大明 2004)。这些新村通常以某一个方言群为主,在考虑语言规划时既要考虑华社整体的语言状况,也要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例如雪兰莪州的沙登新村是个客家村,而且位于吉隆坡郊区,因此进行规划时需要同时考虑客家话和粤方言的作用。以社区为单位的规划属于中观语言规划,也是基于少数民族群的语言规划,也许比较适用于马来西亚华社的情况。

六、结论

本文分析了目前马来西亚华社语言规划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总体而言,目前是进行语言规划的大好时机。而且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信念:马来西亚华社的语言规划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一方面是因为马来西亚华社是多语多方言,为了充分发挥语言的沟通功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系统的规划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语言的认同功能,把语言推广与语言认同结合起来,找回自己的定位。另外,我们需要理解语言资源论和语言经济论,意识到语言是重要的资源,并且可以创造经济价值(Grin 2003)。这样我们就可以跳脱语言政治论的窠臼,从

全新的角度来看待马来西亚的语言问题。

注释

- 1 这项用英语教数学和科学的政策开始于 2003 年,目的是提高学生掌握英语的能力。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马来西亚教育部于 2009 年宣布该政策将于 2012 年新学年废止。
- 2 伊班语是东马土著少数民族伊班族的语言,他们大多居住在砂拉越州。
- 3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的简称,成立于 1951 年,目标是捍卫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其网站为 <http://web.jiaozong.org.my/index.php>
- 4 马华公会是马来西亚以华人为主的政党,成立于 1949 年,目前是执政联盟国阵成员党之一。
- 5 资料来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详细情况见董总网站:<http://www.djz.edu.my/resource/images/doc/DataAnalysis/2010%20SRJK%20ShuJu.pdf>
- 6 华文小学各年级的课程纲要可参考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局网站:http://www.moe.gov.my/bpk/v2/index.php?option=com_weblinks&view=category&id=87&Itemid=384&lang=en
- 7 国民中学的华文课程纲要可参考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局网站:http://www.moe.gov.my/bpk/v2/index.php?option=com_weblinks&view=category&id=88&Itemid=380&lang=en

参考文献

中文

- 郭熙 2012。《华语研究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 罗北振 2012。〈抢救方言由父母开始〉。《星洲日报》2月2日。
- 平凡人 2012。〈鼓励使用方言〉。《星洲日报》1月11日。
- 汪惠迪 2009。〈马来西亚华语规范方略〉。载《敲开语言的窗口:华语的使用现象》。吉隆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
- 徐大明 2004。〈言语社区理论〉。《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页18-28。
- 许运发 2012。〈方言流失与华语〉。《星洲日报》2月22日。
- 叶玉贤 2002。《语言政策与教育——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比较》。台北:前卫出版社。

外文

- ASMAH H. O. 1982.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BALDAUF, R. B. Jr. 2006. Rearticulating the case for micro language planning in a language ecology context.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7(2&3), 147-170.
- COLUZZI, P. 2007. *Minority language planning and micronationalism in Italy*. Bern: Peter Lang.
- GILL, Saran K. 2005. Language policy in Malaysia: Reversing direction. *Language policy*, 4 (3): 241-260.
- GRIN, F. 2003. Language planning and economics.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4 (1):1-66.
- GRIN, F., Vaillancourt, F., Sfreddo, C., 2009. Langues étrangères dans l'activité professionnelle (LEAP), Rapport final de recherche, Université de Genève.
- KAPLAN, R. B. & BALDAUF, R. B. Jr.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HOGAN-BRUN G. 2010. Contextualising language planning from below.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1(2), 91-94.
-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Xiaomei & Chong Siew Ling 2011. A Hierarchical Model for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2 (6) (2011): 577-591.
- ZHOU Minglang 2006. Theorizing Language Contact, Spread, and Variation in Status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16 (2), 159-174.